

# 文盲的州司马

古代的州官通常是一正两副，正州官称“知州”，副州官两人，一个管政务的副州官是文官，称“州同”，另一个管军务的副州官是武官，称“州司马”。州司马虽是武官，文盲者极罕见。然而建钟玉堂的陈后炎（1863—1939），正是文盲的州司马。

福建永春自五代后唐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开始置县，称“桃源县”。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因“冬暖夏凉四时春”改称“永春县”。自置县以来至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之前，一直隶属泉州府。古代福建分为八个府：闽东南四个府分别为福（州）、泉（州）、漳（州）、兴（化）；闽西北四个府分别是延（平）、建（阳）、邵（武）、汀（州）。清代末年为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统治，就在各府的交界地或离府治较远的地方先后增设七个州，由省台直辖。“永春直隶州”就是在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和“龙岩州”（现在的龙岩），“福宁州”（现在的宁德）同时设立。从泉州府分出永春、德化两县，从剑州（现在三明地区）分出大田县归永春州管辖。永春州由省直辖，不再隶属泉州府。直隶州州官的级别介于府县之间。府官为四品，县官为七品，直隶州“知州”为五品，州同和州司马为六品。

后炎公生于公元1863年。因家境贫困，七岁就在家乡当牧童谋生。十岁跟他的三叔到新加坡，在一家裁缝店当童工，没机会上学，是文盲。但他机巧勤奋，很快学会当地各种语言。师傅交办的事情做得井井有条，师傅非常喜欢他。他除

了认真完成师傅交办的事，一有空闲就帮师傅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份内份外的事情都做。他虽然年纪小，但非常懂得尊重体贴别人。当看到师傅个人或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凡是能帮得上的就主动去完成，师傅非常感激，就教他学裁剪手艺。

他原来在做工时，就留心观察师傅怎样给客人量身裁剪。当师傅要教他，他非常高兴，把原来观察中在头脑里留下的问题，一个个向师傅请教。他虽然是文盲，却学会像师傅用简单的图画和符号作记录，很快就学会了手艺。师傅看到他技艺基本过关，做事情又非常严谨，就放手让他去做。凡是他丈量裁剪制作的衣服，客人穿了非常合身，非常满意，就介绍自己的家人和亲戚朋友来店里做衣服。店里生意更加兴隆。

他初试锋芒后，觉得自己能行。此时，他也积累了一点小本钱。决定自己开裁缝店。他趁店里扩张业务，招聘新员工时，向老板提出自己的意向。起先老板尽力挽留并许诺加薪，但他决心已定，答应给老板培养好接班人才走。后来老板看到新手成长起来了，看在多年交情，答应让他自己开店，并给予资助。他自开裁缝店后，由于手艺精湛，服务及时周到，顾客非常满意，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这时，他到新加坡已经只身奋斗了将近20年。快到而立之年了，他仍然是单身汉。刚来时微薄的工资只能糊口。站稳脚跟后有点节余就寄回家乡补贴家用。让小他八岁的弟弟读书。弟弟成年后，他还帮弟弟成了家。自己开店后，他觉得自己也该成家了，就回中国家乡成了亲。他成亲后，把夫人和弟媳留在家乡照顾母亲，将“字墨算盘精（有文化）”的弟弟带到新加坡做帮手。没想到他弟弟去南洋不久，却在一次海难中因沉船身亡（当时交通工具非常落后，海难经常发生），他只好又只身奋斗。但他已经砺练了20年，对当地

环境和店铺管理都非常老道，店里的师傅员工都愿意为他干活，店铺声誉也很好，生意兴隆，事业稳步发展。

当他积累了一定资金后，觉得自己的行业有很大的局限性。地处马六甲海峡咽喉之地的新加坡，是西方商贾进出远东的海路必经之地。这里商机很多，但却是豪商巨贾的竞技场。由于西方现代工业迅速发展，大量价廉物美的成衣进入新加坡市场，而新加坡的店租和员工的薪金也迅速增长。商品大潮从不同角度全方位挤压小本生意和传统工艺。后炎公看到西方商人在新加坡大量收购橡胶、咖啡、椰子油、科藤、檀香、羚羊角、象牙和当地的名贵药材金鸡腊霜，以及其他工业原料，用船运回西方。还听说在马六甲海峡对岸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一些土特产收购价很便宜，收来新加坡出售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但是隔着马六甲海峡，海峡风大浪高，波涛汹涌，交通不便。当地风俗文化与中国、新加坡有很大差异。社会治安也不稳定。有很多事情当地工人不能做，外地工人不愿去。自身安全也没保障。有很大风险。然而居安思危的后炎公为了生存和发展，还是决定去冒险。因为前30年闯过的雄关漫道给了他胆量和信心。

他毅然关了新加坡的裁缝店，来到印尼苏门答腊峇眼亚比亚比。这里是靠近马六甲海峡一个偏僻的渔港。后炎公在那里盖起了“亚答屋”（就是茅草房。亚答树的树叶有点像椰树叶，叶子长长的。像中国的菅草可以编织成草匾盖房子。）购买中国运去的大缸盛雨水作饮用水（周边都是海水，又咸又涩，不能吃喝）。用水要统筹，要非常节约，因为断水就得走人。有时缸里的水存放的时间长了会生子子，还是照样吃喝，没有别的办法。他在那里收购山藤“加将”，做椰子加工。收购当地一种小鱼发酵，制作当地人喜欢吃的食品“峇煎”。

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后炎公在印尼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并积蓄了较多资金。此时，他已近不惑之年，准备回家乡建房子。他回家乡暗中寻找盖房子的地点。虽然发了财，但他没有衣锦还乡，依然穿着粗布汉装衣服，出门随手带着粪篮，凡路上有粪便就顺手捡进篮里带回做肥料。遇到天气不好就带一把雨伞。

他找了好几个地点（也曾经找过东关大路等地的地点），最终选定现在钟玉堂这个地方，就陆陆续续买下相关的农田。当地皮买得差不多了就着手向当局申请盖房手续。由于他“少小离家”，在家乡认识的人不多，更别说走官闻府，况且他没有文化，申请盖房手续这事只能委托乡绅和亲戚朋友。亲戚朋友尽力相助，通过各种关系疏通官府，争取盖房能早日得到批准。然而，时间过了几年，已经花掉了大量资费，也曾得到官府用事者的多次许诺，申请盖房仍然毫无进展。花掉的钱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此时，后炎公在印尼和新加坡都有房子，在海外完全可以过上舒适的老板生活，但他还是心急如焚，想在家乡盖房的志向仍然矢志不移。因为流在他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在家乡有他的妻儿，有他的亲戚朋友，有他难忘的童年，有他安息在家乡土地里含恨离世的母亲……因此，他不能随遇而安。于是，他继续和亲戚朋友探讨申请盖房的办法。有朋友直率告诉他，像之前这样申请就是把钱花光也得不到批准。因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已经腐败透顶，从上到下大小官员都想捞钱，都在贪赃枉法。因此，申请盖房宁可用小锤零敲碎打，不如用大锤冒险，争取一锤定音。后炎公请朋友把方法仔细说出来。朋友告诉他：所有的贪官虽贪，但捞钱都只是排第二位。排第一位是保乌纱帽。因为如果乌纱帽丢了，不仅捞不到钱，还有被问罪的危险。所以，凡是贪官都不讲

正义，不讲公道，“看到兔子就开枪，看到老虎就烧香。”他还告诉后炎公说：“当今朝廷已腐败到卖官鬻爵。上行下效，各级官员为了晋升，也同样要利用权力捞钱以便自己买官。尽管有时也用捐献公益事业遮人耳目，实际也是下贪官自己的腰包。你如果资金许可，不如先用钱搞个头衔，再用该头衔申请盖房用地。如果头衔够大，用事者不敢不批准。

因此，如果要，就干脆往上捐，把头衔搞大些。但这风险也很大，如果遇到官府流氓或人事变动，你的钱照样会打水漂。”

后炎公经过反复思索，还是决定冒险走一回。他先请教朋友：在东关桥尾这种地方盖房子，需要什么头衔才稳有把握得到批准。然后就去行动。真的捐到“州司马”这个官衔。这个“州司马”是荣誉衔（空头衔），只有一份任命书和一套官服。没有具体任职单位，没有一兵一卒，他不在乎。不仅没有分文俸禄，而且把要盖房子的钱多数花光，他早有思想准备。他用这份委任状去申请建房用地，真的得到批准。

房地批准后，后炎公开始着手建房，尽管仍有人制造麻烦，但已不成气候。至于“州司马”的委任状和官服，他收藏起来束之高阁。这套“州司马”官服，后炎公在世时从未穿过。到他离世后才把这套官服和他一起入殓。此时，颁发这套官服和委任状的满清王朝已先死去20多年了。后来，后炎公“州司马”这个官衔只留在他的墓碑和神主牌上。因为这个官衔是他用血汗获取的真金白银换来的，应计入钟玉堂的置地成本（钟玉堂的置地费用远高于建房费用），要让子孙后代知道建屋之艰难。

后炎公获得州司马官衔之后，他对乡亲还是一如既往亲切友好。父老乡亲比他年长者，称他“番炎”（因他少小离家，长年侨居海外），年幼者称他“炎叔”。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封建时代，后炎公还是选择当百姓，

不想当州官。他捐取州司马这官衔只是为了建钟玉堂而已。不用说他去世后，就是他在世时，家乡也没几个人知道他有“州司马”这个官衔，从来没有人用这官衔称呼他。他照样穿着粗布汉装衣，出门随手带粪篮积肥。因为他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要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永春老照片



# 树人的园丁

陈兆柏（1899—1964），是后炎公的次子，他本人文化程度不高，但一生致力于办学树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兆柏早年因父母潜心兴建钟玉堂，从小就要帮忙打理家务，没有较多机会就学，只念几年的私塾。虽然小楷毛笔字写得好，但其实识字不多。他深感文化程度低之苦，中年以后，致力于家族树人和社会办学。

他非常重视家族树人。他把最小的弟弟天来带回中国念书。后来天来学业有成，20世纪30年代末于厦门集美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先在家乡永春任教，成家后举家到新加坡定居。生前是新加坡爱同学学校教务主任。

他密切关注孩子的成长，三儿子巨水起先在印尼就学，他发现孩子在学校没有专心学习，有不少时间用于学生活动，与左派学生交往密切，担心其荒废学业和出事，就将孩子转到新加坡就学。孩子到新加坡不久，他又发现孩子在新加坡参加左派学生活动。为了让孩子专心念书，他把孩子转回中国就学。起先托人找永春中学校长，想让孩子进永春中学念书。后来听说南安一中更好，就把孩子送往南安一中就学。

他是一位严父，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不让孩子从小有不良的行为习惯。有一次发现小儿子东溪跟小朋友玩赌火柴棒，马上把孩子叫回家痛打一顿。并晓之以理，告诉孩子“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会让人养成不劳而获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好吃懒做，走向犯罪。要从小认真学习文化，学习真本领，不能有侥幸取胜的心理。孩子从此就不再和小朋

友玩赌火柴棒或赌任何东西了，成了非常优秀的学生。高中和大学都是学校出类拔萃的学生模范。

他又是一位慈父，在威严的外表之内是一颗慈爱之心。他无论在家乡还是在海外，无论是家族的孩子还是邻居的孩子，都主动去接近和关心。对有困难的孩子，他都会热情资助。对有不良行为的孩子，他肯定要严厉批评并告诉其父母，绝不会听之任之。

他教育孩子是从小抓起。他公元1954年回国，大孙子维新才三岁，刚会讲话，他就教孙子学印尼语，让他学会用印尼语从一数到十。他公元1960年回国，孙子还在上小学。他从海外买回两大盒铅笔和一大叠练习本，整天教孙子练字。他还用古代私塾用的教本《幼学琼林》教孙子：“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让不习惯读孔子书的孙子觉得痛苦不堪，但面对威严的爷爷又不敢不认真念。当他带其他小孙子游东关桥时，大孙子要跟去总会被他狠狠地训斥：“学字！”他为了让孩子从小立志刻苦奋斗，利用夜晚休息时间给孩子讲家史，讲先祖苦难的童年和拼搏的经历。

兆柏公是孝子，他前大半生继承父业为续建钟玉堂费尽心血。钟玉堂的内外装修基本是他完成的。他除了修建钟玉堂，还修建父母和所有先人的坟墓。最后一次回国，还请照像师和他到山上，给他父母坟前照像。但是，为了发展家乡教育事业，他还是舍小家为大家。

公元1949年新中国成立让他看到希望（解放前他对旧政府乡绅官僚贪腐非常不满，曾当面批评揭露其贪腐行为，导致乡绅官僚对他恨之入骨，叫杀手准备把他处死），他在家乡东关桥尾创办“东关私立树人小学（初级班）”，请名师来校任教。曾任永春县教育局长的郑中枢老师曾到该校任教。

后来“东关私立树人小学”拼入公办的东关小学。兆柏公从此停止钟玉堂屋的续建，全身心投入东关小学的捐资募资建设校舍工作。他公元1954年回国再出洋时，东关小学组织全校师生隆重热烈欢送，与他合影。

此后，他除了自己带头捐资，还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边卖药边游说乡亲捐资办学。终于募集了第一笔资金，于公元1958年建成东关小学第一批新校舍（两座，现东碧中学前身）。又于60年代初再建两座校舍。兆柏公于公元1964年在马来西亚逝世。他捐资募资兴办东关小学的工作到他临去世前才停止。

中国有个“杜鹃啼血”的故事：杜鹃是一种花，也是一种鸟。杜鹃鸟又名子规，也称布谷鸟。传说是古代蜀王望帝杜宇的化身。据说杜宇派部下凿巫山治水有功，就把王位让给部下，自己死去化为杜鹃，整天催人耕耘播种。巴山蜀水的乡亲每当看到黄金稻海遍天府的丰收景象，就感激催自己耕耘播种的杜宇。如今兆柏公呕心沥血筹资开创的东关小学新校舍所在地，已成为东碧中学美丽的校园。当年“欢送陈兆柏先生南渡”的东关小学学子，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然而当年印象尚存。当东关的父老乡亲看到家乡成长的参天大树变为社会的栋梁，难道会忘掉当年开园育苗的园丁吗？



## 一忆父亲

印尼雅加达 陈德辉（东关伟公陈氏二十三世）

我们兄弟姐妹是钟玉堂廿三世，父亲是第廿二世，名火车，字轴成。我们兄弟姐妹共有十六口，十男六女，直到今天，我总是非常钦佩父母卓越的能力，想在那个年代，父母能把一家十六个儿女养大成人，而且能让他们得到一定的教育程度（两位大学，九位中学和五位小学），而且不会由于家费的沉重负担，而引起事业的衰退和家道中落，这可见父亲是一位勤劳又智慧的商人，而且对家庭和事业具有极高的责任感。

父亲念书不多，充其数大约是小学三年级程度，但由于勤工勤学，很快就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他十三岁时，祖父就把他送到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吉隆坡当商店的学徒，学了两三年的经商功夫，就回来印尼峇眼亚比帮阿公经营永兴什货店，以后阿公就让父亲开设永成号什货商店，独当一面，经营食粮土产等项目。

父亲早出晚归，经过几年的奋斗，终于把永成商店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商家，经营出入口批发生意，代理国内外一些名牌货品，如利华国际公司之日用品，新加坡源崇美茶庄之名茶，新加坡太丰公司之饼干，雅加达德尔达锚牌啤酒，北干峇汝（Pekan Baru）罗士拉之巴东烟（烟草），爪哇斗旺（Tarik Malaya）之花纸伞等等，还经营出口橡胶、椰干、香料等土产，寄往新加坡和马来亚（后来至七十年代，父亲搬往棉兰，永成号由三弟德志及七弟德发继续经营，并扩展代理国际BAT公司之香烟，印尼食品公司之快熟面，MIWON之味精调味品等）。

父亲自开设永成号以后，他一有空闲就和店里才副（文员）陈泽高（永春小姑人氏）学习中文及簿记，很快在三四

年间，就能读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今古奇观》等经典古册，也能书写商业书信。记得我们小时候，父亲吃晚餐后，常常讲故事给我们听，这些故事就是来自《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如今我们兄弟姐妹都懂得许多中国古代故事，也就是深受他老人家的影响。至今我们兄弟大家都喜爱读书，喜欢书写绘画等文艺。

父亲在商场的诚信和人际关系影响深远，使我们兄弟后来在国内外商界得到无比的方便。兄弟哪一位到国内外，如新加坡、马国、台湾、印尼棉兰、雅加达、泗水、北干峇汝等市，只要去找父亲的朋友，都给我们兄弟许多经营的机会，或介绍有关商家。

由于父母的严格教导，我们兄弟姐妹就健康的成长起来，一般都能积极生活，爱劳动爱学习，女的就学母亲煮饭、烧菜、帮忙看顾弟妹们，闲时学做针线活儿。而男的就轮流到永成商行去学做生意和打扫店铺等等。

我们感恩父母的爱护和教导，使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能安居乐业，各自创业做生意。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位染上不良的嗜好，甚至没有一个有抽烟、喝酒、赌博等不良习惯。（其实父亲的生意延续到我们这一代，都有经营代理香烟和啤酒，却没有一个被烟酒所惑。）

如今我们兄弟各自都有独立的企业。大家生活总过得去。在社会上也受到人们的尊重。我总觉得，我们的祖父陈后炎、伯父、父亲等长辈所授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优良品德影响深远。所以要对长辈们感恩感德，慎终追远，把长辈们拥有的奋斗精神，继续延续，并发扬光大，让钟玉堂的光辉，世世代代发光发热，照耀着新时代的到来。

# 无价遗产

## (父亲的故事)

印尼棉兰陈德贤（东关伟公陈氏二十三世）

每次有商务到雅加达，习惯住在二姐家。二姐家有阿爸，有说不完的家常，和二姐闲聊，是一种享受。那天我要回棉兰，班机是中午时刻，得九点从二姐家出发。像往常一样，二姐必给我准备峇眼口味的早餐，吃完早餐，时间已是八点出头，按习惯阿爸应该坐在床沿边，喊着帮他坐上轮椅，开始新一天的生活；阿爸老来双腿不良于行，坐上轮椅也好几年，其他器官还算合乎他的年龄，稍有空闲，兄弟们都会轮流的来带他去游车河，到餐馆聚餐，其乐融融。

我推门进了阿爸睡的房间，他两眼开着，脸色不好，看似非常疲惫。我告诉他，今早要回棉兰，他却说，今早一醒，两条腿像是脱离了身体，一点知觉也没有。我打开被单，触摸到爸的双腿，冰冷的有点异常，我即刻用“黄道益”舒筋油替他摩擦，并在脚板推摸，帮他做腿部一般的伸展动作。几分钟后，双脚有点回温，但还是不听使唤。心想爸的腿本来就有问题，应该不会有大碍。我安慰爸几句，他却嘱咐我一路小心。真没想到这是我和爸最后的一次简单对话。出了房门，把爸的情况告诉二姐，推着行李，乘机回到棉兰。

几天后，大哥来了电话，说阿爸当天就住进医院，情况不好，病情复杂，至今医院还没法对症下药，要我赶回雅加达。听到讯息后，心中一阵惊悸，脑子盘旋着乱七八糟的几种可能。稍安以后，我做了安排，订了机票，隔天就飞回雅

加达并直奔医院。

重症加护病房里，几天不见，爸就变了个样，面浮肿，没点血色，双眼闭着，手上插着输液。鼻子、口中都插着管道，看情况他已失去吞咽能力。我一阵心酸，强忍泪水，靠近爸的耳边说我来了。他尚有知觉，慢慢张开那已失去光彩的双眼。爸看我一眼，又闭了。这时他嘴巴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我转过身，泪水不停而下，这一次阿爸恐难逃天数。两天后，阿爸终于敌不过病魔弃我们而走了！兄弟姐妹们都围绕在他的身边，从此亲恩未报，留下无尽的哀思，痛哉！

举丧之日，从各地来悼哀的亲朋戚友，络绎不绝，甚至远从棉兰，泗水的几个八九十岁的老友，在儿女陪同下，都特意赶来奔丧。丧礼中，诵读悼文的峇眼乡贤洪先生对阿爸的一生，作了总结性的评价，认为在事业中他创设“永成宝号”，信誉卓著。家庭中夫妻恩爱，养育十多个孩子，个个都有其所成。社交上看今天场面，足以见他人缘颇好。事业、家庭、社交，人生这三大追求，他都非常成功。如今以积闰八十九岁高龄作古，堪称真正的“福寿全归”。

记得那年棉兰初中毕业后，回到峇眼，本想再继续升学，无奈政府颁布新条例，凡印尼籍公民不得就读于中文学校，就此留在峇眼跟阿爸学做生意。那时三舅也在店里帮忙，按当时讲，他是店里的“财付”，相等于二把手。三舅一手硬笔字，漂亮极了。我跟着他学中国式的“四柱”账法。后来三舅自立门户，店里的账目，就由我抄录。阿爸经常教导做生意要讲诚信，并说我们“永成号”敢于用黑底金字招牌，说明你的生意是有信无欠，所以更要坚守诚信。如有失信，是会被泼上黑油。这是当时的一种民间处罚，如你商场失信，店里的招牌就会被泼上沥青（俗称黑油）。如你有犯上

桃色新闻，很可能被泼上臭屎。若这样，你就休想在地方立足。那个年代，通讯、交通非常不便，商场上要互相了解，全靠口碑相传，远在千里外的商家，爸只要一封信，你要多少的货物，都可安全抵达指定的地点。有些来往的商号，爸和他们老板，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面，但生意上却从来没有间断过。爸常教导我们兄弟，诚信是商家无限资本，千万丢不得。

六十年代，印尼政局非常混乱，通货膨胀，盾币每况日下。为了保值，手头上一有印尼盾，就马上兑换成马来西亚货币。这在当时属于犯法，因为政府严禁外国货币流通。为逃避搜捕，商家就把真货币改成白纸，用海产作为单位，譬如纸上写着黄鱼十斤，那表示马币一千元。峇眼海产丰富，捕到的鱼虾大部份都运到新马一带，换来白纸，就这样在市面上流通。记得有一次爸手上有两万多元的白纸，收藏不小心，被一种叫“剪纸”的白色小昆虫吃得剩下一些小纸屑。当时两万多元不是小数目，一家人都非常郁闷。阿爸却满自信的说可以补回，他即刻写了封信，把情况告知新加坡友人，并转向发出白纸的马来西亚商家陈述。不到一个月，新加坡友人来告知，失落的款项已一分不少的汇入爸的户口。没有凭据，单凭口述就可以完璧归赵，足见阿爸的商场信誉。

爸要养活一家十余口，又遭到六十年代政局的动乱，市场萧条一片，加于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应时而生，经济损失非常惨重，至七十年代资金所剩无几，当时我们兄弟又开始相继离开峇眼外出谋生，资金不足，就专凭爸在商场的信誉，得到星马等各地友人的帮助，使我们能稳步的开展我们的事业。

爸没留下多大的财富，却留下“诚”“信”这无价遗产，足够我们兄弟享用一生。

## || 义薄云天兄妹情

马六甲海峡东岸的马来西亚波德申，是一个风光旖旎的海滨城市。这里海水湛蓝纯净得像无边无际的蓝宝石。璀璨的阳光把这一望无际的“蓝宝石”照耀得更加光彩夺目。海边巨大浓荫紧紧镶嵌着“蓝宝石”，不留半点缝隙，那是高大的热带雨林延伸到海边。在海边林荫大道内侧，有一片美丽的墓地，钟玉堂的儿子陈兆柏就在这里长眠。

兆柏公没有在这里买墓地，也从来没想到会安息在这里。这墓地是他的妹妹陈金枝买下的，准备她和丈夫自己用的。兆柏公元1963年最后一次回国，永春医院内科主任医师陈以仁告诉他肝已硬化。他自己叫人在家乡永春东关桥尾的山上找一块坟地，已经把墓的粗坯做好，洞穴也挖得只剩最后一框土，还用山石把墓砌起来。外行人看去俨然是一座真坟墓。唯一的标志是墓碑的位置没有砌“人”字石。这只有内行人才知道。兆柏公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就把夫人留在家乡，自己只身重返南洋，准备和新加坡永裕隆药行结清货款后就回家乡安度晚年。

兆柏公与药行结清货款后，还用一些时间再游说乡亲捐资建东关小学，并就募捐建校之事与同仁进行移交。当他把事情办完正准备返回家乡时，却突然倒下了，并马上去世。当时由于国际关系原因，子女均无法前往料理丧事，其后事全由其二妹金枝姑负责料理。她为兄长料理完后事，就从巴生把兄长的灵柩运回波德申，安葬在自己要用的这块墓地（后来她自己只好再买一块离海边较远的墓地）。

据说，金枝姑年轻时曾经得过肺病。当时的肺病是很难医治的。兆柏公千方百计到处寻医找药，直到把妹妹的病治好。

每年清明节，金枝姑都和她的儿子李齐孩以及孙子孙女们给兄长扫墓、祭拜。公元1978年当中国一开放，她立即将二兄的遗物、经商装钱的皮带、卖药用的手提箱、切药的专用小刀，还有衣服等送回故乡东关，交给其家属。金枝姑此行开创了传递亲情的破冰之旅。她返回南洋后，向海外亲人介绍家乡和家乡亲人的状况。从此，钟玉堂海内外亲人逐渐密切往来。

半个多世纪以来，兆柏公的坟墓都是金枝姑的儿子李齐孩及孙子孙女们打扫、祭拜、管理。公元2017年，当听说钟玉堂被洪水冲毁，年近九十高龄的齐孩叔在女儿女婿和外孙的陪护下回家乡察看，并为修复工程出资。公元2018年，兆柏公墓碑上的肖像损坏，齐孩叔和其大儿子招裕给予修复。公元2019年，钟玉堂修复工程竣工庆典，齐孩叔虽已九十高龄，仍不远万里第一个决定出席庆典活动。

金枝姑与兆柏公的兄妹深情是钟玉堂传人的典范。钟玉堂家族一百多年来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保持发扬和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学习和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钟玉堂传人的观念已经摆脱封建的传统意识。他们既保持中华民族传统的骨肉深情，又在男女平等、内外一致方面走在时代的前列。这不仅会成为钟玉堂家族的优良传统，而且会成为中华民族学习和吸收世界先进文化，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典范。

将来你如果有机会到马来西亚波德申的海边墓地，离海边马路内不远，墓碑上刻着“恭栋陈公”的就是兆柏公的墓，“恭栋”是兆柏公生前为自己取的“号”。再往里过一个低

洼的地段，墓碑上刻着“常允李公、金枝娘”的，就是金枝姑和姑丈李修执的墓。这两座坟墓像马六甲湛蓝的海水和波德申茂盛的海边森林紧紧偎依着，这就是永不分离的兄妹之情。



## | 拿幡旗的弟弟

按传统习惯，在葬礼或做功德道场上拿幡旗的是儿子。而在兆柏公葬礼上拿幡旗的是他最小的弟弟陈天来。

陈天来（1918—1983），是后炎公最小的儿子，兆柏公最小的弟弟，年龄比兆柏公小十九岁。母亲去世时，天来公才十岁，兆柏公长兄如父，把弟弟带回中国念书。天来公集美师专毕业后，在家乡永春任教，兆柏公帮他成了家。成家后，天来公举家到新加坡定居。天来公在新加坡爱同学校任教，后来当爱同学校的教务主务。

公元1964年兆柏公在马来西亚巴生逝世时，由于国际关系原因，在中国和在印尼的儿子都无法前往马来西亚为父亲送终。兆柏公的后事是他的妹妹金枝和弟弟天来料理的。兆柏公去世后，天来公马上给兆柏公中国家属报告兄长去世的消息，并索取办理丧事的有关资料。他奔赴马来西亚巴生，帮姐姐料理二哥的后事。在葬礼上，他顶替侄儿为哥哥拿幡旗。葬礼结束他和姐姐护送哥哥的灵柩到波德申安葬。

天来公在学校是名师，得到学生、同事和家长的尊敬，在社会上德高望重。在家里是好丈夫、好父亲，对家人荫护备至。他文化功底扎实，字画书法出众，晚年在新加坡开书画店。他是钟玉堂第一个真正的文人。

半个多世纪以后，钟玉堂的老前辈都先后作古，但他们的风范犹存。老一辈开创的孝悌笃亲的家风，必将在钟玉堂传人中代代相传。

## | 宁折不弯做唐人

陈德种（公元1922—1989），字德嘉，后炎公之孙，兆柏公长子。他酷爱自己的祖宗和祖国，充满中国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以自己是“唐人”（中国人）为豪。

他从小在家乡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虽然十八岁离开家乡后就没有机会再返乡，但中国传统文化在他脑海中根深蒂固。他爱自己的故乡，孝敬自己的长辈。他为人聪颖，善于经商。他前半生事业有成，全力帮其父兆柏公续建钟玉堂厝和兴建家乡公益事业。他珍藏着钟玉堂落成初年的照片，经常跟儿女讲：“我们中国家乡东关这座钟玉堂有二十几个房间。”在他事业有成时，他尽了自己仁兄的职责，竭尽全力培养弟妹念书和成家。

他为人刚直，性格执着到有点固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居住国要求华侨加入当地国籍，如果不加入当地国籍，就不能与该国公民享受同等待遇，经商等各方面都要受到歧视和限制。

当地政局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使德种公的事业和家庭压力山大。家人和很多亲戚朋友劝他顺应时势加入当地国籍。但他觉得自己是炎黄子孙，是堂堂的中国人，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坚决不加入当地国籍。因此，他受到当地政府的制裁，本来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事业江河日下，最终走向崩溃。

虽然德种公受传统思想制约不能外圆内方，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他作为炎黄子孙的赤诚之心令人敬佩。“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

古流。”德种公对祖国对家乡对亲人的挚爱和对钟玉堂的贡献将永远载入钟玉堂的史册，为后人所景仰。



## 丨一丝不苟的奉公者

陈传温（公元1926—2004）字德淳，后炎公之孙，兆柏公次子，中国古汉语读音相同或字形相近的字，意思可相通，可互相借用，“淳”可通“醇”，而“醇”就是酒。因此，人们叫他的外号“温烧酒”。他的心胸像烧酒一样纯净，性情像烧酒一样刚烈，对工作充满激情，做事公私分明一丝不苟。

他当水力加工厂的出纳员，整天与钱打交道。虽然数额不大，但笔数却不少。每天晚上，他一定要把当天的账目理清才休息。有时遇到账目不符，他就一遍又一遍核对，哪怕三更半夜。凡是发现有多收顾客的加工费，哪怕是一分钱，他都会送上门去。如果发现少收了，哪怕是一分钱，他也会找人家补。顾客来用小麦兑换面粉，他会要求小麦要足干，晒不干的一律不给换。

他会经常在夜晚电灯亮了以后，上门查电表，哪怕是刮风下雨，还是寒冬腊月。当发现有人绕过电表偷用电，他会把用户的电灯泡当场没收。

他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公元1949年回家乡成亲是办来回护照。成亲后中国南方的解放战争尚未结束，船路不通，未能及时返回印尼。解放战争结束后，中国换了新天，旧护照不能用了。新中国与印尼尚未建交，他就留下来建设新中国。他对新中国充满希望，准备为之奋斗，就把自己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叫“为新”。解放初，他担任过乡侨务委员，曾出席晋江专区侨代会。

他为人耿直，没有私心杂念。做起事来一心扑在工作上。公元1958年东关水力加工厂创建时，虽然工作地点离家不是很远，但他坚守工地，连续几个月没回家。

不是自己的东西，他一点都不不要。有一天晚上在下班回家路上捡到一袋东西，里面有几块香皂和一块新布料。他就拿着袋子到处寻失主，忘掉自己还没吃晚饭。当晚没找到失主第二天继续找。后来才知道是供销社一个售货员回家路上丢的，马上把东西交还失主。

他是一个刚强的硬汉子，具有顽强的毅力。公元1961年，他在加工厂上班时，裤子卷进传动皮带轮，上腿粉碎性骨折。当时的医疗条件只能靠骨科中医用手把他包在皮肉里的碎骨头捏在一起。他在炎症消退后配合医生坚持锻炼。炼了几年，终于会不拿拐杖走路。但残脚比正常脚短了一大截，他就踮着脚尖走，还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

他拔草是不留草根的。他拔草时经常带着坏剪刀，用剪刀把草根挖得干干净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他儿子开垦了一片柑桔园。垦荒前这里苦竹和金刚刺丛生。这两种植物根深蒂固，很难清除。他就整天用尖锄一遍遍反复刨，终于把这两种植物的根彻底消除。

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会用毛泽东的语录教训家人孩子：“世界上的事情最怕什么你知道吗？最怕‘认真’这两个字！共产党最讲什么你知道吗？最讲认真！”他的孩子们在他的严格要求和熏陶下，也做事认真、工作拼搏、廉洁奉公。这种无私严谨拼搏的家风将会代代相传。

## || 出生入死的开天战士

2014年夏天，骄阳似火，陈巨水（钟玉堂第三代，后炎公之孙）走完他光荣的一生。在他的葬礼上陈列着永春县老干部局、东碧中学校董会和永春商业部门送的花环。他生前是离休老干部，曾任东碧中学校董会董事长。离休前在永春商业部门几个单位任职。

陈巨水生于公元1929年9月14日，早年侨居印尼。少年时代在印尼接触马列主义，开始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此事被他父亲发觉后，担心他出事，把他转到新加坡中正中学就学。他到新加坡后，继续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并经人介绍加入马来西亚共产党。他在新加坡参加革命活动让其父有所闻后，其父担心他的安全和荒废学业，立即把他送回中国，让他在南安一中念高中。那是一九四七年，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战场和共产党军队决战兵败如山倒。全中国“反内战、反饥饿”的学潮、工潮风起云涌，陈巨水到南安一中马上投入革命运动，并和李庆源、李应举、曾汉英等几位同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闽西南地下组织。

1948年，陈巨水和李庆源、李应举、曾汉英等几位同学放弃学业，受组织派遣回家乡永春东平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他们以东平冷水永隆宫等为活动地点，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宣传中共部队在中国北方胜利的消息，组织“反内战、反饥饿”，抗税抗租等活动，并组织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东平地下支部，陈巨水任支部书记。

陈巨水等人的东平地下团支部积极配合中共东平地下党

支部（李正宗任书记）开展革命活动。他们策反当地的帮会组织，组织成立革命武装部队。后来东平这支革命武装部队加入湖洋黄起寮、郑士照、郑亚天等人领导的中共永春东区游击队。1949年5月，陈巨水所在的永春东区游击队配合张连领导的永春西区革命武装第一次解放永春县城。后来由于北方败退的国民党九十六军过境永春和中共策反的西区康明深土匪武装叛变，刚成立的永春县人民政府撤出永春县城转入山区。1949年8月23日，永春东西区地方革命武装部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再次解放永春县城。陈巨水参加东区游击队从永春东部攻打永春县城，永春很快解放。

永春解放后，成立新的永春县人民政府。新成立的永春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总共只有30多人，陈巨水被组织分配在人民政府财粮科工作。当时财粮科只有几个人，康政栋任科长，陈巨水和苏昌培（后来任福建省副省长）任科员。后来随着人民政府机构完善，财粮科分设为财政局和粮食局，陈巨水被组织分配在粮食局任保卫干部。他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被党内坚持“极左”路线的人认为海外关系复杂，没有被批准，并被调离粮食局保卫干部的要害岗位，到永春县食品公司任副经理。陈巨水的赤诚之心虽然未被组织完全信任，但他肝胆未忘一寸丹，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自己做人的底线，用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除了努力工作，他还勇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讲真话。1959年反右倾期间，他由于讲真话，被内定为“中右分子”，这件事他自己直到多年以后才知道。他被内定为“中右”后，被派到永仙公路工地任民工营长。他同样毫无怨言，在新岗位努力工作。1960年精简机构干部大下放，他没有带薪被下放回原籍东关当农民。其家属原是永春医院护士也受株连被下放。

在人生的低谷，陈巨水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党政府的绝对忠诚。他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协助乡村干部组织农民开会学习，宣传共产党和政府纠正之前“大跃进”时的“共产风”“浮夸风”，宣传新政策，动员乡亲要相信党和政府能带领大家渡过难关。因被下放，没有工资收入，经济困难，除了靠在海外的父亲接济，他有空余时间就到溪里捕鱼给家人改善生活。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他都始终表现出一个革命战士在困难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无比坚强。捕鱼也是他一生的爱好。从渔钩、渔网到电鱼机（当时没有禁止）他都用过。有一天晚上，他和二哥在东关桥下钩到一条9.2斤的大鳗鱼。后来他经常夜晚和侄儿或其他人去溪里捕鱼。那时溪里鱼很多，捕一会儿就是一大箩。出门时只带一种调味品，就是用小瓶子装一点盐巴。捕了鱼后在溪边船上借船家的锅灶和柴火，把鱼肚撕开，挤掉内脏，和清水投入锅里，再投入盐巴，煮熟后就是美好的夜宵。

1962年落实政策后，陈巨水重新参加工作被派任永春县外贸公司副经理。后来又转任永春县商业局业务股长，任永春县食杂公司副经理，永春县果品公司副经理。虽然工资待遇一直保持新中国初期定的“副区级”，但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始终没有被批准。尽管这样，他在各个岗位都努力工作，并且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

到果品公司后，他利用自己原来做外贸工作的人脉基础，又利用改革开放生产力大发展、国家外贸政策放宽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永春芦柑的种植和销售。他先后到山东、湖南等地取经，回来因地制宜推广外地经验。广阔的外贸市场使永春百姓的芦柑卖了好价钱，推动了全县种植芦柑的热潮，一两年间，永春的荒山野岭被开垦成梯田式的柑桔园。但当时多数柑桔园还是刚种下的幼龄树，尚未投产。在总结永春

芦柑生产销售经验时，陈巨水坚持实事求是，与有关领导产生意见分歧。他因深入生产销售第一线，掌握永春芦柑生产第一手资料，知道永春芦柑种植面积确实达到十几万亩，但多数尚未投产，目前未能达数十万担，那数字应是几年以后的事情。如果汇报产量不实，就会交不了货，影响信誉和市场稳定。正因为这样，他又被调离永春果品公司，到基层供销社任副主任。

1979年，家乡东平和东关（当时东关尚未设镇，还属东平镇）的海外侨亲开始准备在家乡捐资兴建学校。海外的亲戚朋友出于对他的信任，希望他能在家乡帮助做这件事。他于是决定申请退休（后来政府出台离休政策，他改为离休），出任永春八中校董会副董事长和东碧中学校董会董事长，东关小学校董会董事长。1980年，他的“中右分子”得到平反，落实政策，他正式成为离休老干部，享受国家的离休待遇。20世纪80年代，他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充分发挥余热，争取海外侨亲在家乡投资兴建校舍。家乡东关镇的东碧中学和东美村的东美小学在他努力下，校舍建筑面积迅速增加，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他因而得到海内外广大乡亲，特别是投资者及学生和家长的赞誉。

陈巨水一辈子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他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舍生忘死。他在胸怀普罗大众的同时，也始终热爱钟玉堂，热爱自己的祖先，关怀自己的亲人。在“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所有祖先神主牌都要被收集烧毁。他冒着政治风险提前把钟玉堂镏金的神主牌收藏起来，大厅的神龛用木板和门帘围钉起来，外面贴上红联，写上革命对联，中间贴上毛主席的像，使钟玉堂的神主牌和神龛得以保存。他始终关怀着家族中的老老少少，尽力为家族中亲人的事情奔波，尽力维护亲人的正当权益。

陈巨水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执着追求理想，他爱国爱家，关心天下劳苦大众，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舍生忘死。他两次参加解放永春，为永春人民开辟新天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无论何种处境，都始终保持自己的信仰，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他敬老爱幼，尽力关心帮助家族亲人。他艰苦朴素一辈子，他用自己的一生为钟玉堂增添光彩。他永远是钟玉堂人学习的楷模。

东关桥附近老照片



# 粽子飘香

## 二姐的故事

印尼棉兰陈德贤（东关伟公陈氏二十三世）

小时的姐，喜欢挤在大人身旁，两眼不眨地看着长辈们包粽子，有时候两只小手无意地摸摸这儿，碰碰那儿，慢慢地随着年纪的增长，也学会扶平粽子的叶子，梳理绑粽子的绳子；挂吊在倒置的椅子脚上，像一缕缕柔发，随微风舞动。在几个姑妈中，五姑妈最疼姐姐，常拉着姐的手说：“小柳子手儿巧，心眼灵，长大做起女红，一定有条有理。不输于人”。说着说着总轻轻拧下姐的面颊，爱惜地把她紧紧抱在怀中。

五姑妈当时还待字闺中，两颗大眼睛亮汪汪，修长的身材，一头乌油亮发，剪得与肩齐平，当时她一定很美很美。忘了是那一年，父亲带着五姑妈，离开渔村，嫁到苏北省先达埠，从此我们不叫她“五姑妈”而改口叫她“先达姑”。当时交通相当不便，从渔村到先达，要先乘船到亚沙汉港口，货船设备简陋，乘客要和咸鱼、杂粮挤在一起，还要经过十多个小时海上层层叠叠的浪涛。抵达亚沙汉后，改搭公车，炎热的天气，公车在哪凹凸颠簸的麻子路上跛行，飞扬的尘埃，没空调的车子，昏车晕浪，想象那是多么令人劳累畏惧的行程。从此“先达姑”再也没有回到渔村。

五姑妈对姐的影响很大，虽然都没读过几年书，手中都离不开书本，古版的《红楼梦》《今古奇观》《再生缘》都经常重复阅读。流行歌曲中的歌词除唱以外，还经常大声朗

读。就这样，姐也慢慢地变成了文化人。小时候弟妹们争宠的围绕在她的身边。一到黄昏时刻，邻居的小孩也都聚在我们的家，家外面的“五脚基”顿时成为课堂，静听二姐讲述忠孝的故事。姐还有一手绝活，那是烧得一手好菜肴，闽南家乡风味的“三封八炒”：什么“封猪脚”、“封猪肚”、“封鸡”、“封鸭”、“炒肉骨酥”、“炒猪脚米粉”，无不色香味齐全。她还做得一手糕点，传统的“红龟”、“发糕”样样都会。尤其是“面粿”配上“卤肉”，至今再也找不到那令人垂涎三尺的口味。她做的惹娘糕香喷喷，未入口中，满室已飘来椰子的香味，而且一做就是几十种。每逢新春佳节，来家做客的亲戚朋友，品尝后，都赞不绝口。

姐绑的粽子，更是家喻户晓。每年粽子飘香日子，“先达姑”总是千方百计的托人把先达产的粽子叶寄到渔村。先达的粽子叶又宽又长，是包粽子的上好材料。“先达姑”还特地煮洗干净，叠成一束束，还会夹上一些上选的佐料。更珍贵的是不忘寄来片言字语，慰问一家平安。姐包粽子非常讲究，坚持粽叶一定要先蒸了以后再包。吃时稍微煮过就行。选料更是一点都不含糊：糯米粒粒如珍珠。精选的虾米如红宝石。肥肉不油腻，切成一小块。佐料有栗子、香菇、蒜头、腊肠等等，无一不用上汤炒过。一碗碗地排列在铺在地板的草席上，左邻右舍的阿姑阿婶，和姐同龄的姐姐们，围着圆圈，一边没完没了的叙说家常，一边包着粽子。二姐就像指挥官，不停的指着包粽子不到家的点点滴滴。邻居阿婶常跨说姐是星宿下凡，包粽子粒粒工整，斤两不差。“我们凡夫俗子，学得她三分手艺，已算不错”。

岁月悠悠，一家人也由孩儿慢慢变老，先后由渔村迁移到棉兰，而后多数定居在雅加达。年复一年，纵使在大动荡年代，“先达姑”也未曾疏忽过，每年都寄来粽子叶，每当

姐接到这份无限亲情，不尽温馨的无价瑰宝，总禁不住双眸潮湿。姐常说姑妈对我们的疼爱，像爹妈一样，是长辈对后辈无尚无悔的爱。正是这种爱，凝聚华族数千年绚丽不朽，绵延不息的儒家思想道德。

姐同样的未曾间断，每当粽子飘香的季节，姐总会绑着一大堆，分别送到各自的家，渴望大家喜欢品尝。更希望能将这份爱，这一份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亲情，在我们心底下，绵延不息，无休止的伸展。

印尼棉兰老照片



## 堂叔暮年乡情不已

公元2017年初冬一个黄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位海外归来的耄耋之年的长者，在家乡亲人的陪伴下，撑着雨伞，迈着稳健的步伐，沿着狭窄的田埂路向钟玉堂走去。这位长者是后炎公之孙，火车公的长子陈德辉。他出生于公元1933年，已经85岁高龄，居住在印度尼西亚。这是他专程赶回故乡察看被“莫兰蒂”台风洪水冲毁的祖屋钟玉堂。

陈德辉早年立志高远，“先天下之忧而忧”。年轻时积极参与当地社会工作，为当地报纸《大众报》、《洛江日报》和《燎原月刊》的主编之一。他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经常撰文点评社会真伪，是鲁迅所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正猛士。

他为人肝胆厚道，热心助人，乐于奉献。自经商以后，经常慷慨捐献社会公益事业。对有困难的友辈，总是热情援助，为之排难解困。因而，他赢得友辈和世人的敬仰。

他敬老爱幼，敦亲睦族，思乡念祖。自中国改革开放后，他多次返回故乡，为家乡亲人排难解困。公元2011年，他为修缮续建钟玉堂和钟玉堂百年庆典尽力呼吁，带头捐资。在他的带领下，钟玉堂人筹集一笔资金，将钟玉堂倾斜开裂的墙体修复，并将正面封砖。将破损的屋顶修复。正因为这样，公元2016年在“莫兰蒂”台风洪水的冲击浸泡下，钟玉堂的正面墙壁才能完好保存。

百年庆典更深远的意义是编辑《百年钟玉堂》这本书，

把钟玉堂传人的信息集中起来。举行庆典活动，让海内外亲人欢聚一堂。这些使钟玉堂家族的凝聚力大大提高。以上这些得以实现，应首推德辉叔之功。他发动海外亲人搜集提供有关的信息资料，出资出力。组织海外亲人回家乡参加庆典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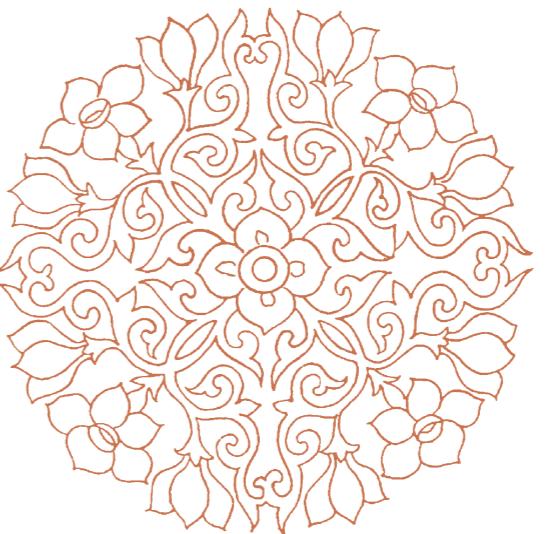
家乡东关伟公陈氏家族从公元2009年至2015年用七年时间进行第四次续修族谱，德辉叔组织钟玉堂海外亲人积极配合。除了及时提供钟玉堂海外亲人的信息资料，还动员海外亲人为修谱工程捐资。单他们兄弟六人就捐了人民币两万多元。为了肯定他对修谱的贡献，家族会授予他“东关伟公陈氏四修族谱编委会荣誉副主任”。

德辉叔在钟玉堂家族中德高望重，具有很高的威信，得到全家族的尊敬和爱戴。之所以能这样，和他对整个家族的人关心爱护是分不开的。他的二姐素柳姑晚年基本由他和家人照顾，直到姐姐终老。他最小的妹妹海燕姑生病到马来西亚槟城医院手术治疗。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眼睛等身体有些地方有故障，亲自到槟城医院照顾妹妹。凡与家乡亲人通电话都要问及安否。每当知道有难，马上伸出援助之手。

2016年中秋节，钟玉堂被“莫兰蒂”台风的洪水冲毁。当德发叔把水毁现场的照片带到海外，德辉叔看了非常吃惊，焦急万分。马上安排时间亲自回家乡察看现场。回印尼后立即与他几个兄弟筹划出资修复之事。决定首期出资二十万元人民币，分两笔及时寄回家乡，为钟玉堂修复的首期工程提供资金保证。

在钟玉堂修复过程的几年中，德辉叔曾经因做眼疾手术等几次住院。他不顾病痛，时刻关注钟玉堂修复工程的进展。每当资金快用完，他们都会敏感发现。他就亲自或者叫他的弟弟发信息打电话，要求家乡报告资金欠缺情况，及时组织

资金援助。当他知道钟玉堂水毁工程修复竣工要再编一本纪念册，不顾自己已经87岁高龄，而且刚做白内障手术不久眼睛不好使，亲自写回忆他父亲的文章。还搜集提供一些珍贵的老照片。并亲自组织庆典资金，落实回乡参加庆典的人员。德辉叔是钟玉堂优秀的儿子。他用自己的血汗和威望组织修复和续建钟玉堂，让倒下的钟玉堂重新站起来，让钟玉堂在洪水中巍然屹立，用自己夕阳的光辉把钟玉堂照得更加光彩夺目。钟玉堂是他的丰碑。他对家乡的深情，对亲人的厚爱，对钟玉堂的贡献，将和他生平其他可歌可泣的事迹永远载入钟玉堂的史册，激励钟玉堂人奋勇前行。



# 书法伴我行

印尼雅加达陈德志（东关伟公陈氏二十三世）

1938年我出生在印尼一个小小渔村峇眼亚比，印尼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热爱印尼，但同时始终不忘我的祖籍国，尤其是祖辈们世世代代生活过的地方中国福建永春。那里山明水秀，人文荟萃，一年四季，风光明媚，自古有“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美誉。

老家有我的亲人，几代人互相扶持，历尽多少春秋，艰苦奋斗，格守祖德，凝聚族亲力量，延绵至今，已有二十多代，四万多人，尤其是二十一世，二十二世，我们的公公伯伯等先辈们，离乡背井，经历了千辛万苦，远渡重洋来到星、马、印尼一带谋生，艰苦创业，有成就后（阿公是二十一世），就回老家兴建“钟玉堂”，而其后人就留在东南亚这一带。当年古国未曾开放，亲人无法往来，但在南洋的亲人且经常造访，关怀至深，留下了无数感人回味，深深铭记。如今古国已经改革开放，亲人的来来往往，已不是一回事，相信“钟玉堂”子孙会是更加繁荣昌盛。

年幼时，正好逢上日本南进，就此失去了适龄的入学机会，一直到将近十来岁才开始踏上校门：我读书成绩不好，唯独对书法艺术有特别偏爱，当时老师教我们临摹柳公权字体，每次书写出来的作品，都被选用贴在学校壁报之上。老师还经常用我的作品作为示范教材，这给我很大的鼓励。后来学校增加黑板报，并把所有的作品标题由我一手负责。为使黑板报更为出色，标题的字体与内容更贴合，我开始学习

美术字，很遗憾当时没有专业老师指导，仅靠从书中自己摸索学习，也因此受到极限，无法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准。

记得在一次工作中，校中的一个董事孙先生，他是一个电影戏院总经理，正想物色个负责广告部的人手，当时他就认定了我，并鼓励我到他戏院工作，我想一面读书，一面赚些零用小钱，何乐而不为，就答应了他的聘请。没想到戏院广告部工作多，根本无法照顾到学校功课。我本书读不好，年纪又大，借此机会，小学没毕业就停学，专心注入戏院的工作。戏院广告涉及面很广，我开始学油画，学制作幻灯，没想到在戏院工作，一干就是好几年。这时大哥也从新加坡回来，他带回大量的美术参考资料和书本。大哥一向喜欢阅读和辨证，我们也深受他的影响。如今能书写一点东西，全靠当时自学得来。

六十年代，印尼政府颁布种种反华条例，并开始全面禁止华文的传播，戏院也被查封，华文和毒品一样犯法，从此搁笔长达三十年。至九十年代，中印恢复外交关系，新政府开始逐步解禁排华条例，此时华社如雨后春笋，迎来百花盛开的季节。

华文解禁后不久，首都雅加达开始有书法爱好者组织书法学社，最先成立的是“印尼书法家学会”，随后有“印尼书法学院”“印尼龙文化书社”“孔子学院书班”“文苑书社”“慈济书法学习班”等等。中国书法艺术，开始又在印尼大地充满着生机。我也开始重新整理我那尘封已久的文房四宝。虽年过古稀，手一握起毛笔，肆意挥毫，心情之畅快，犹如回到那年青时在戏院广告部生活。我的作品也先后在本地报纸发表。除了书写些传统的字体如楷书，行书，隶书，篆书外，也因为当年学习美术字的影响，经常加上自创的字体和插图，也许有些新鲜感。我的作品也经常在显著的版位

刊登，这给我很大的鼓励。在众多书法家当中，我特别偏爱毛主席的书法。他的字气势磅礴，豪情奔放，笔随意法，文采风流，的确达到书情合一，书意合一，书文合一，书境合一的四合境界，可真的是一代大师。

我于2015年受聘为“印尼书法家协会”荣誉顾问，一有空就会到会所和各位领导老师共同学习，交换心得。同时也经常参加国内，国外的书法活动，多次参展参赛，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每逢新春佳节，雅加达一些著名寺院都会举办一些迎春活动，其中也有书法展览。我经常被邀请举办个展，并把销售所得，捐献给寺院作为奉扬佛法和慈善经费。

书法伴我一生，虽无法成家，但也充实了老年生活，可喜的是老来作品能容入国内外参展，总算聊以自慰。感叹今生无所作为，不能为钟玉堂增加光彩，惭愧！仅借此小文祝古国兴旺，钟玉堂子孙世代相传，万世其昌。

印尼老照片



《百年钟玉堂》这本书的序言题为“至孝笃亲”，作者是后炎公之孙，火车公的四子陈德贤。文如其人，他就是至孝笃亲的楷模。

陈德贤公元1939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他未曾有机会回中国的故乡福建永春东关。他牢记父亲生前的嘱咐：“将来如果条件许可，就得常回家乡看看。”中国刚开放，他就于公元1987年带着妻儿，与二姐素柳一起回到家乡永春东关。当时中国和印尼还没有恢复邦交，他们回故乡还得偷偷摸摸。他们一踏进国门，感到无比亲切，像回到母亲的怀抱。由于当时中国交通条件还很差，他们的车在崎岖的路上颠簸了四五个小时才从厦门到达自己的故乡永春。然而，当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乡，感到非常亲切，无比兴奋，把路途的疲劳忘到九霄云外，与家乡亲人在钟玉堂前合影。游览东关桥，在家乡这千年古桥拍照留影。此后，他多次带家人回东关寻根谒祖。

他对长辈竭尽孝道。他家住棉兰。棉兰在印尼苏门答腊岛。从棉兰到雅加达比到新加坡还远。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多数住在雅加达。他一有空，就前往雅加达看望父母和兄弟姐妹。晚年他父亲住他二姐家，每次他到雅加达，下飞机就奔往二姐家看望父亲。父亲脚不好使，要坐轮椅。他一到二姐家，就会给父亲按摩双腿，或者用轮椅把父亲推到河边散步。

他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勤奋自学，又善于学习，文字功底很好。公元2011年钟玉堂百年庆典时编了一本纪念册《百年钟玉堂》他为海外每位亲人写列传，并为该书审稿、写序。还创作《心愿·调寄十算子》这首词：“桃源抱东关，东溪斗紫气，先公南疆独往来，延脉好光景，德荫子孙兴。故国昌盛日，孤鸿归根梦成真，长伴钟玉堂。”他的诗文字

里行间洋溢着他对祖国、对家乡、对祖宇的无限深情。“孤鸿归根梦成真，长伴钟玉堂”表达了钟玉堂人至孝笃亲的心声。钟玉堂的海内外游子数百人，遍布于世界各地。他们身在他乡，心却“长伴钟玉堂”。只要有机会有能力，他们都会学习德贤叔“孤鸿归根梦成真”。哪怕树高千丈，哪怕身在天涯海角。2019年钟玉堂水毁修复工程竣工庆典再编一本纪念册《钟玉堂的故事》，德贤虽已进耄耋之年，还是亲自写怀念父亲、怀念二姐的文章，并且写得非常亲切动人。

德贤叔非常关心家乡亲人。他多次启发家乡亲人要学习经商发展经济。他对家乡、家族的公益事业热心奉献、慷慨出资。公元2011年钟玉堂百年庆典、公元2015年东关伟公陈氏家族第四次续修谱，还有2016年以来的钟玉堂水毁修复工程，德贤叔都和几位兄弟一起慷慨出资。他还发来印尼颖川堂的照片，建议对钟玉堂内部进行精装修。

德贤叔对祖宇挚爱，对长辈尽孝，对亲人关怀备至，继承和发扬了钟玉堂的优良传统，的确是钟玉堂的孝子贤孙。他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动去谱写钟玉堂人至孝笃亲的壮丽诗篇。他的事迹将和他的诗篇一起永志人心。他是人们学习的楷模。

# 润物细无声

## 一忆叔叔东溪

叔叔走了快三年了，我一直想为他写点东西，但总是写不出来，只是泪流满面，心像快要碎掉似的。鲁迅说，长歌当哭，必须在痛定之后。

陈东溪（1940—2018）是后炎公之孙，兆柏公最小的儿子，我最小的叔叔。他的年龄刚好介于我和父亲之间，和我最接近，我俩又经常和我奶奶在一起，很多人以为他是我哥哥。

叔叔不善表达，“讷于言”，但他“敏于行”，凡是我们钟玉堂家族谁有困难，他总会第一个帮助。我记得堂弟冠鹏刚出生不久有一次发高烧，叔叔连夜用自行车载三婶带他去县医院住院。

公元1973年，我工作了以后又再到厦门大学念书。虽然没有带薪，但学校给我最高的助学金，每月有十九块五。奶奶和叔叔还是担心我不能生活。奶奶叫叔叔把每月给她的钱转寄给我。叔叔每月就把五元人民币装在信封里寄给我。当时叔叔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多元，婶婶才刚转正，工资更低，全家有四五口人，生活也非常困难。我叫叔叔不要寄，他还是寄了。我就把钱存起来，寒暑假回家时去同安买花生油等带回家。

我订婚时，是叔叔和我作伴。公元1989年我得到了评中级职称的机会，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申报材料。叔叔到我家帮整理材料，弄到三更半夜。

公元2000年我的侄儿胜达考上大学，叔叔和我跟二弟一起带他注册。叔叔和我们一起奔波到中午快一点才吃午饭。公元2009年，叔叔听说侄儿胜达要买房子，自己主动送一万元借给他。

公元2011年钟玉堂百年庆典，叔叔虽然生病住院刚出院不久，他还是亲自组织并带头去冲洗钟玉堂。如今钟玉堂修复竣工，又快庆典了。今天如果他还健在，最起码还会再帮我组织的。

当年我二弟农药中毒住院。叔叔知道了，马上赶往医院帮忙看护。

叔叔从高中到大学，都是出类拔萃的学生模范。叔叔非常珍惜自己的荣誉，每张奖状都带回家，贴在自己房间的墙壁上。每当叔叔回家，我都会马上凑过去找他。他上高中时有一年放假回家，他几个老同学和他一起来我们家玩。我问叔叔为什么有这么多奖状，叔叔的同学跟我讲叔叔在学校学习优秀，劳动积极，还当了学校团委书记。叔叔公元1961年考上漳州师院。在大学仍然出类拔萃。他在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漳州师院还号召全校同学向他学习。叔叔非常关心我的成长。我上小学时他回家总会给我买点书回来。我记得《雷锋的故事》等几本书就是他买给我的。

叔叔从小有劳动的习惯，念书时回家，除了帮助家务，有空就到溪里捕鱼。他比较习惯在溪里放鱼钩，压虾箩。傍晚放，第二天早晨才去收。他参加工作以后节假日回家，遇到农忙季节，他会去帮忙收割水稻。

我和叔叔也真的亲如兄弟。叔叔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仙游银行工作。当时交通非常不便，永春到仙游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大约七点左右开车。而东关到永春县城的公路是泥土路，坑坑洼洼，自行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每当他从仙游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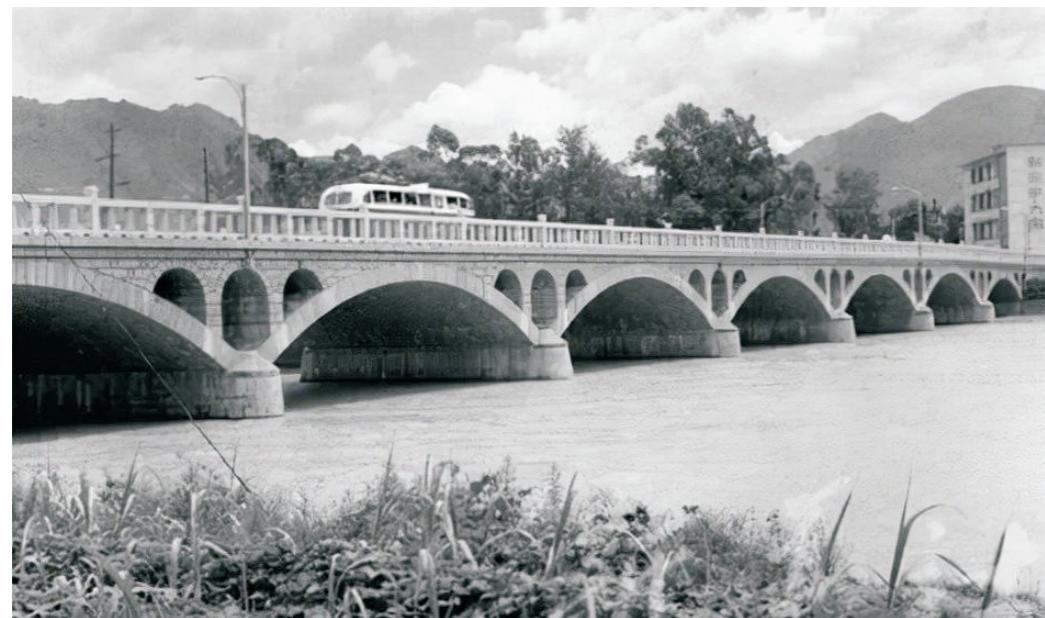
我会骑自行车到县城或到济川路口接他。他要回仙游，我就用自行车送他去县城搭车。记得有一次，早晨我们要去县城赶班车，刚好半路遇到大雨，两人都淋湿了。

我每当出差路过仙游，都会在叔叔家停留。到了叔叔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因为叔叔婶婶对我都很好。记得有一年叔叔和婶婶一家都住在濑店水库工地，我路过仙游时还特地到水库工地去找他们。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叔叔和婶婶调回永春工作，而且是在离家很近的东关茶果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叔叔东溪和二弟宁波是我的左臂右膀。我工作繁忙不能回家时，家里有事都交代他们。现在他们两人都走了，家有疑难可问谁？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叔叔东溪就像春天的及时雨，用他一生滋润整个钟玉堂家族。现在他走了，但每当我遇到困难，他还会给我力量，激励我勇往直前。愿叔叔在天堂安息！

永春老照片



## | 印尼永春乡亲的公仆

堂叔陈德美，生于公元1943年，是印尼永春同乡联谊会创会发起人之一，曾任印尼永春同乡会名誉会长兼总务长，现任印尼永春同乡会名誉会长。他为印尼永春乡亲的联谊、为印尼乡亲与家乡及世界各国乡亲的联谊努力工作，积极奉献。

记得德美叔第一次回家乡永春是八十年代初出席广交会时，被出席广交会的其他乡亲带回来的（听说后来他在安溪办来料加工厂，从韩国进料，在安溪加工，再从香港转口到欧洲意大利等国出售）。从此，他几乎凡到中国必到家乡。在中国与印尼恢复邦交之前，他回家乡也是挺神秘的样子，恐怕被人知道。他关心家乡亲人，有时出席家乡的联谊活动也要把家乡亲人带去。家乡亲人觉得做不速之客不体面，就没有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山美水库扩蓄加高，钟玉堂是拆迁对象。他向当局提出应该保留这座珍贵的历史建筑海外所有钟玉堂人才有寻根谒祖的中心。公元1999年，他还出资三千多元人民币，修复被破坏的屋顶。

家乡亲人有困难，他会伸出援助之手。公元2002年其堂侄宁波因柑桔园喷农药中毒，抢救无效去世。他出资两万元人民币，帮助宁波的儿子念大学。

他为钟玉堂海内外亲人的联谊积极奔波。在公元2011年钟玉堂百年庆典时编一本纪念册《百年钟玉堂》，他提供了大量海外亲人的信息资料，提供一些亲人的联络电话，并踊

跃出资。他还和钟玉堂其他海外亲人向家乡当局提出把钟玉堂作为华侨古民居保护。公元2015年东关伟公陈氏家族第四次续修族谱，他踊跃出资。公元2016年，钟玉堂被“莫兰蒂”台风洪水冲毁，他得知信息后，马上打电话了解被毁情况，并为修复工程慷慨出资。临竣工时，当他知道尚欠缺资金，就动员他的子女也出一些资金。

他提供马来西亚波德申齐孩表叔子女的电话，使家乡亲人和波德申亲人取得联系。齐孩叔和家乡取得联系后格外高兴，虽已年届90，马上决定回家乡永春寻根谒祖，并为钟玉堂修复工程出资。修复工程竣工，齐孩叔第一个决定回乡参加竣工庆典。

德美叔对钟玉堂亲人的帮助、对永春乡亲、对钟玉堂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被亲人铭记和敬仰。但愿子孙后代学习和发扬他这种精神。

## || 植根永在故园中

记得出席钟玉堂百年庆典是德源叔和他的家人第一次回故乡。他们对家乡的一切感到无比亲切。德源叔和堂妹晓霓在庆典晚会上发言，表达对家乡亲人和家乡山山水水的无限深情。

德源叔是我爷爷的亲侄儿、我的堂叔，他公元1944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已是第三代华裔。他早年在印尼经销印刷设备与器材。近几十年随着经济全球化，他走出印尼，把商务拓展到世界各地。之前由于市场竞争剧烈，商务繁忙，他没有机会返回故乡。但他牢记父亲生前的嘱咐：“有机会要经常回家乡看看。”如今他已过耳顺之年，能实现自己回乡的夙愿，当然格外高兴。

德源叔极像他的父亲（我的叔公）火车公，聪明勤奋，善于学习，沉着稳重，极讲信用。在当今这知识爆炸的年代，印刷术和印刷设备迅猛发展。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印刷术和印刷设备也快速更新，新设备不断涌现，用不了多久又成了旧设备被淘汰。德源叔用他的睿智和勤奋，始终控制技术的制高点。用他的沉着稳重，准确把握投资的方向和目标。他的信誉不仅稳住客户，而且成了无声广告，使生意越做越红火。其商务遍及印尼爪哇岛各大城市，并在上海、广东、越南等地投资。他为商务要经常在美国、中国、印尼、越南等地穿梭跑动，难得有机会回故乡。他事业有成不忘公益，亲友有困难他必定相助，几达有求必应。他热心参与校友活动，对奖学金、助学金经常慷慨解囊，深得同辈

们的赞赏。

他热心出资修缮续修钟玉堂。公元2011年为钟玉堂的百年庆典慷慨出资，并拨忙携家人回家乡出席庆典。公元2015年家乡东关伟公陈氏家族第四次续修族谱，他慷慨出资。公元2016年钟玉堂被“莫兰蒂”台风洪水冲毁。当看到德发叔从家乡现场拍摄的满目疮痍的倒塌状况，他非常震惊，百忙之中马上与兄弟商讨如何出资修复。当德辉叔回家乡察看钟玉堂，知道修复工程所需费用后，他积极联络兄弟达成共识，他们马上决定出资二十万元人民币，使钟玉堂第一期修复工程有资金保证，得以及时顺利进行。

他无论商务多繁忙，无论到世界什么地方，都时时在关注钟玉堂修复工程的进展，关心工程费用欠缺情况。每当修复工程的资金快用完，他都及时发现，并立即再出资援助。

钟玉堂家族虽然在海外发展了一百多年，绝大多数人未曾回过家乡，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却在其传人中代代相传。德源叔的父亲火车公也是海外出生，只在童年回过家乡，后来因时局变化，就再也没有机会回乡。他却经常在思念家乡，

并嘱咐孩子们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回家乡。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因此，德源叔从小就酷爱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中国制造出口到印尼的每样东西，他都很感兴趣，并要弄清是何时何地生产。

古代中国人就能制造精致的陶器和瓷器，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到东南亚各国。印尼是一个万岛之国，海岛周边全是咸水，陶瓷耐咸，不怕腐蚀，人们就用中国出产的陶缸储存淡水，喜欢用中国瓷器餐具。德源叔从小就有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为自己的祖国能向世界传播文明而自豪。每当看到年代较久的陶瓷，他都会有心收藏。实践出真知，由于长年的日积月累，他对中国瓷器有极高的鉴赏能力，最

终成了陶瓷文物专家。

他早年因商务活动走遍世界。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进博物馆，看是否展出中国的古代瓷器。当他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看到许多中国古老而精致的瓷器，感慨万分。他对近几十年在印尼等海上丝绸之路上打捞沉船发现的瓷器非常关注，潜心研究。他高深的专业造诣和巨大贡献，赢得同行的尊敬和信服。他是印尼陶瓷文物协会理事，是中国广州市古玩行业商会副会长。也是亚太网印与制像协会副会长。长期与国际同业保持交流与合作。

公元2019年7月上旬，他为考察钟玉堂修复工程的进展专程从印尼赶回家乡永春东关。在回家乡期间，他见缝插针考察中国陶瓷古文化，在回乡之前他就认真备课，从网上查阅文字资料决定沿途参观晋江磁灶古窑址、泉州船舶馆和海上交通展览馆。在他刚下飞机往永春的路上，他不顾路途疲劳，叫司机载他参观晋江磁灶古窑址和晋江博物馆。在返回途中，顺路参观泉州船舶馆和海外交通馆。当他走进展馆，馆里的展品使他流连忘返。整整参观了半天，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多展馆工作人员要下班关门来催促。当天中午一点多才吃午饭，他酷爱中国的古代文明真是到了废寝忘食。

在家乡，他认真考察自己的祖屋钟玉堂，对如何进一步修缮保护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他觉得不能光有一座房子，还应该去搜集一些约50至100年的生活器具等来陈列，逐步增加钟玉堂的信息量。他建议此次钟玉堂修复工程竣工庆典的纪念品以瓷盘为佳。他还用专业知识具体分析此建议缘由：最能收存保留的纪念品非瓷器莫属，因瓷器耐水耐寒，耐高温，不怕虫蛀菌霉。还举出中国古陶瓷可存数千年的例子。他渊博的知识和循循善诱，让家乡亲人非常佩服，马上达成共识。他还仔细参观考察了八百多年的古迹东关桥，对中国古代高